

语言学研究

如何定义构式? ——认知取向与社会取向之争

黄均¹ 王立永²

(1. 四川外国语大学 商务英语学院, 重庆 400031; 2. 陕西师范大学 外国语学院, 陕西 西安 710062)

摘要: 构式语法作为理论语言学的重要流派,其核心概念“构式”的定义始终是学术争论的焦点。以戈德伯格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将构式视为心理储存单位,侧重其认知属性,而哈斯普马特和西尔文诺伊宁对此提出质疑,主张构式应基于社会规约定义,以突出其社会属性。为回应这一争议,系统梳理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理论源流与演变,剖析两位学者对认知取向的批评及其社会取向主张,进而重新阐明认知属性与社会属性在构式定义中的内在统一关系。在此基础上,为将社会属性系统性地整合进构式分析,借鉴“固化—规约化模型”,尝试构建一种认知与社会的协同表征机制,旨在为构式的多维分析提供可操作的方法路径,推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的进一步完善。

关键词: 构式定义; 认知取向; 社会取向; 双重属性; 认知—社会协同表征

中图分类号: H0-06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1674-6414(2026)03-0040-15

DOI: 10.26922/j.cnki.waiguoyuwen.2026.03.004

0 引言

构式语法自20世纪80年代诞生以来,历经30余年发展,产生了众多分支(详见 Hoffmann et al., 2013; Hoffmann, 2017; 牛保义等, 2020; Ungerer et al., 2023),其中影响最大的当属以阿黛尔·戈德伯格(Adele Goldberg, 1995, 2006, 2019)为代表的认知构式语法。在该理论框架中,构式被定义为心理储存单位,具有鲜明的认知属性。2023年,为纪念构式语法诞生35周年,构式语法专刊 *Constructions* 刊发了两篇专题论文,分别为著名语言类型学家哈斯普马特(Martin Haspelmath)撰写的《构式为何物?》(On what a construction is)(下称 Haspelmath, 2023)和构式语法学者西尔文诺伊宁(Olli Silvennoinen)撰写的《构式

基金项目: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博士、培育)项目“英汉论元缩减机制的认知语法研究”(2025BS024)和四川外国语大学
校级科研项目“跨语言视角下宾语共享的认知语法研究”(sisu2025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 黄均,男,四川外国语大学商务英语学院讲师,博士,主要从事构式语法研究。

王立永,男,陕西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副教授,博士,主要从事构式语法研究。

引用格式: 黄均,王立永. 如何定义构式? ——认知取向与社会取向之争[J]. 外国语文, 2026(3): 40-54.



本刊微信公众号

语法是认知取向的吗?》(Is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下称 Silvennoinen, 2023)。两篇论文对构式语法的认知取向提出质疑,主张基于社会规约的构式定义更为合理。这一争议直指构式定义的核心问题,厘清相关困惑对语言的构式分析至关重要。

鉴于此,本文基于上述两篇专题论文及相关文献,详细评述构式的认知取向定义和社会取向定义,并在此基础上指出构式定义应兼具认知和社会双重属性,尝试构建二者的协同表征方式,旨在超越取向之争,探索一种整合的方法路径。

1 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起源及演变

1.1 构式概念的理论背景

当代语言学理论的核心任务是描写说话人的语言知识(Chomsky, 1957, 1965)。然而,针对语言知识的本质和组织方式,不同理论流派观点各异。生成语法核心假设之一是词库和句法的截然对立。然而,语言中大量存在的熟语表达对该模式形成了巨大挑战。在生成语法看来,熟语虽然结构复杂,但语义不可分解,因此与词汇具有同等地位。然而,正如希尔珀特(Martin Hilpert, 2019: 3-8)所指出,该看法面临诸多问题。首先,日常语言充斥大量熟语表达。其次,很多熟语表达并非由固定词语组成,可由空位填充,如英语中的 Big Mess 构式(如“too big a shock”“quite useful a lesson”和“how big an area”)。最后,很多带空位的熟语表达能产性较高,如英语中的倚变构式(如“the more...the merrier”“the bigger...the better”和“the redder...the deadlier”)。换言之,熟语和词汇并不完全等同。

为了更好地解释熟语在语言中的数量及其能产性,菲尔墨等(Fillmore et al., 1988)、卡利科弗(Culicover, 1999)及卡利科弗等(Culicover et al., 1999; 2005)学者提出与生成语法不同的语言分析思路,即从熟语性表达出发建立一套语法体系,同时将所谓规则表达也纳入其中。熟语表达具有结构的整体性和语义的不可预测性两大显著特征。构式(construction)这一全新理论概念的提出,正是为了系统性地概括和解释具有这类特征的语言单位。

1.2 构式的定义演变

戈德伯格在其专著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Goldberg, 1995: 4)中将构式定义为:

当且仅当 C 是一个形式意义的配对 $\langle Fi, Si \rangle$, 且 Fi 或 Si 的某些方面无法从 C 的组成部分或此前已有的其他构式中严格预测时, C 即为一个构式。

上述构式的定义,可归纳为以下三方面:(1)形式意义结合体;(2)语义的不可预测性;(3)词汇和语素的构式地位(二者都是音义结合体,且语义不可预测)。

戈德伯格(Goldberg,1995)的构式定义简单明了,且具有较强操作性,但受到兰盖克(Langacker,2005)的质疑。兰盖克认为,如果将构式定义为大脑中储存的固化规约性语言单位,即使是语义可预测的单位只要固化程度较高,依然可被认定为构式。在兰盖克看来,戈德伯格定义的谬误之处在于混淆了构式的概念本质和判定构式的手段。

为应对这一批评,戈德伯格(Goldberg,2006:5)将构式定义进行补充和修订,指出“只要有足够的使用频率,即使具有语义可预测性,结构体仍然以构式进行储存”,具体如下:

任何语言结构体,只要其形式或功能的某些方面无法从其构成成分或已存在的其他构式中严格预测出来,即可被视为构式。此外,即使结构体完全可预测,只要出现频率足够高,它们也会作为构式被储存。

实际上,在戈德伯格之前,菲尔墨(Fillmore,1988:36)就已经提出了语法构式的明确定义:“语言中被赋予一个或多个常规功能的任意句法模式,以及该模式的规约性意义及其规约性句法环境。”相比戈德伯格(Goldberg,1995,2006),菲尔墨(Fillmore)的定义虽不够简明,却更加严谨,明确指出了形式和意义间配对的内涵。与戈德伯格不同,菲尔墨未将词汇和语素纳入构式范畴,在他看来,构式本质上是句法模式。此外,菲尔墨未将语义的不可预测性作为构式判断标准。不难想象,早期构式语法的研究对象多为熟语,而语义的不可预测性本身就是熟语的定义性特征。不可预测性实际上已经蕴含在菲尔墨构式语法理论框架之中。

此后,构式语法著作基本沿袭戈德伯格(Goldberg,2006:5)的定义,如希尔珀特(Hilpert,2019:22)同样将构式视为心理知识,指出:“构式是形式—意义配对体,它们或具有不可预测的形式特征,或具有非组合性的意义,或具有足够高的使用频率从而能够被作为整体记忆。”

与此类似,霍夫曼(Hoffman,2022:4)认为:“构式是(音系/句法)形式与意义的任意配对,储存在说话者的心理词库之中。”此定义强调构式是储存在大脑中的语言知识,具有心理现实性^①。

2 社会取向构式定义

本节介绍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2023)的主要

^① 关于构式定义的详细演变,请参见姜望琪(2022)和昂格雷尔(Ungerer et al.,2023)。

思想,包括他们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质疑以及所提出的社会取向构式定义主张。

2.1 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质疑

本小节从四方面梳理两篇专题论文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质疑:(1)构式定义的多变性;(2)构式界定标准的模糊性;(3)混淆个体与群体;(4)概念识解的社会性本质。

2.1.1 构式定义的多变性

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通过梳理构式语法诞生以来的重要研究著作与教材,指出构式定义具有多变性。这一点在戈德伯格的系列定义中尤为突出:1995年的早期定义以不可预测性为核心,并未明确认知属性;2006年修订后,构式被明确赋予认知属性,强调高频表达式亦可作为构式储存;而2019年的最新定义则彻底放弃了不可预测性标准,转向强调神经认知基础。

由此,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 7)得出结论:“构式语法学界不存在固定的构式定义。”鉴于构式概念使用的广泛性,他主张采用不预设认知取向的构式定义,以避免定义不一致产生的混乱与争议,使其“为不同理论和研究方法取向的语言学家们所使用”。

2.1.2 构式界定标准的模糊性

如前文(1.2小节)所述,戈德伯格(Goldberg, 2006)对构式的修正定义中,以使用频率作为构式判断标准。然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频率标准面临多方面困难。

首先,使用频率和心理固化并非完全对应。虽然高频率接触有助于学习,但单个范例也可能产生强的记忆轨迹(Divjak, 2019)。常见高频率句法格式通常具有较强记忆表征,但罕见格式同样有可能(Divjak, 2017; Flach, 2020)。有些情况下,频率最高的使用格式可能并非最凸显的原型格式。

其次,构式具有个体和跨语境差异。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将语料库中的使用频率作为构式判断依据,面临一个基本问题:所谓“足够”的使用频率标准是因人而异的,甚至同一个人由于疲劳、注意力等因素在不同语境中也会有所差异。

再次,从方法论看,简单语符统计存在缺陷。研究发现,许多频率效应可通过高分散度(high dispersion)等混杂变量来解释(Gries, 2022)。这种复杂性表明仅依赖频率数据无法解释构式的概念本质,须采用统计关联和其他更复杂测量方法(Stefanowitsch et al., 2017)。

最后,频率标准具有模糊性。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将频率作为构式判断标准带来连锁悖论(the Sorites paradox),因为足够使用频率的界限并不清楚。虽然

一般情况下构式建立需要足够使用频率,但研究发现有些语言表达即使只使用一次也能建立心理表征。构式和非构式到底如何判断成为一大难题。

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同样指出,将构式视为心理单位面临着两大难题:语言知识的个人差异与连续性问题,而这两者需通过定性心理手段加以确认。相比之下,社会规约具有绝对性,不存在心理构式所蕴含的渐变性,若将心理属性从构式剥离,仅将其视为社会规约,则可避免这些问题。

2.1.3 混淆个体与群体

混淆个体与群体区别是两篇论文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最大批评。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援引马尔(Marr, 1982)对信息加工科学三层次假说对语言学研究归类。据马尔(Marr, 1982),信息加工可从三个层面分析,分别为:(1)任务分析;(2)运算;(3)贯彻执行(叶浩生, 2011)。其中,任务分析层面关注信息加工的任务和目的,运算层面关注过程,而贯彻执行层面关注“硬件”支持。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认为,转换生成语法属于任务分析层面,因其关注抽象语言能力,而非具体使用;心理语言学关注运算层面(加工机制),而神经语言学则聚焦于观察执行层面(神经认知机制)。

在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看来,认知构式语法理论目标和具体实践相悖。具体而言,该理论旨在刻画个体说话人大脑中的心理表征,属于运算层面研究任务;然而,其在论证心理表征时却采取语料库方法和频率调查,实际上揭示的是超越个体的群体语言使用特征和规律,这又属于任务分析层面的研究。

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这种混淆个体和群体概念面临两方面挑战。其一,心理表征存在个人差异。如在东布罗夫斯卡(Dąbrowska, 2008; 2012)的波兰语所有格临时词(nonce word)实验中,受试者对于阳性名词后缀的选择表现出四种不同倾向:(1)使用同一词缀标记所有名词;(2)基于有生性特征使用两个不同词缀;(3)基于更具体的语义标准使用两个不同后缀;(4)基于更分散的分布使用两个不同的后缀。由此,似乎可得出结论:“我们不能将个体语言使用者的心理表征等同于群体层面的语言规约。”(Dąbrowska, 2016: 486-488)

其二,句法和认知过程具有非同构性。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特定句法结构在产出过程中可能受制于多个认知过程,故任意语言用例(usage event)都难以确定背后唯一对应的认知表征。该表征甚至不属于个体大脑,尤其是那些由互动双方共同构建的句法构式。此外,心理表征的具体组织方式也不甚清楚。因此,西尔文诺伊宁

(Silvennoinen, 2023: 6) 指出: “最好不要将(集体的)语言概括等同于用于产生它们的(认知)心理语言表征。”

2.1.4 概念识解的社会性本质

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指出,构式的认知取向定义的理论基础之一是语义的概念主义立场,而概念识解(construal)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理论工具。戈德伯格虽未明确将语义定义为概念识解,但明确强调其核心地位,如戈德伯格(Goldberg, 1995: 39)就指出论元构式“将基本的人类体验编码为其核心语义”。对概念识解的内涵和具体维度,详见认知语法开创者兰盖克(Langacker, 1987; 2008)的相关论述。

兰盖克(Langacker, 2008: 43)指出概念识解是对同一客观场景的不同概念化方式,其认知取向不言自明。然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引用默托宁(Möttön, 2016)认为,概念识解虽有认知上的体现,但归根结底是一种社会交际行为。在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 7)看来,构式毫无疑问体现概念识解,但概念识解是“交互性(intersubjective)而非个体性的(individual)”。也就是说,概念识解方式的选择并非出于说话人心理状态的表达,而是在于满足互动需求。

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以英语“oh”的语义来说明概念识解的社会性本质。根据Silvennoinen,若从个体心理语法出发,“oh”会被分析为“表示心理状态变化的直接信号(a direct signal of a change in mental state)”。借用默托宁(Möttön, 2016)相关术语,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将“oh”界定为说话人以前一话轮为基础的认知状态变化。这一语义并非固定不变,而是根据互动场景的变化而变化,例(1)~(2)中“oh”的语义细微差别就是证据。

(1) Shi: .hh When do you get out, Christmas week or the week before Christmas. (0.3)

Ger: Uh: mm two or three days before Ch[ristmas,]

Shi: [oh:,]

(2) Jen: Okay then I was asking and she says you're working tomorrow as well,

Ivy: Yes I'm supposed to be tomorrow yes,

Jen: Oh:::,

(Heritage, 2005: 192)

2.2 社会取向构式定义的主张

本小节首先介绍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所主张的社会取向构式定义的理论基础,即语言的社会规约本质,然后介绍社会取向构式

定义的基本思想。

2.2.1 语言的社会规约本质

西尔文诺伊宁 (Silvennoinen, 2023) 运用波普尔 (Popper, 1979) 的“三个世界本体论” (three-world ontology) 来讨论语言的社会性本质。根据该理论,语言存在于三个层面:(1) 物理层面(声波、字形、手动或非手动符号);(2) 心理层面(说话人的心理状态);(3) 社会层面(社会规约)。在波普尔看来,作为社会现象的第三世界对语言来说是最重要的。根据波普尔,语言和其他社会习俗一样,其存在和发展皆源自各自的“有用性”(usefulness)。而对语言来说,最大的有用性就是其交际功能。虽然语言的产出过程(production)发生在第二世界,但是作为产品(product),语言属于第三世界,因为作为交际工具其已经超越个体层面(Geeraerts, 2016:529)。

实际上,索绪尔对语言的定义以及对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的区分已蕴含了语言的社会符号立场。近年来,认知语言学界兴起的所谓社会转向^①(Croft, 2009; Harder, 2010; Geeraerts, 2016; 束定芳等, 2021)的本质就是回归索绪尔的社会符号立场(Geeraerts, 2016:536)。在盖拉茨(Geeraerts, 2016:532-533)看来,语言知识本身就是“社会性分布的共享知识”,语言即为“体现交互主观性、历史性和社会可变性的工具”。受盖拉茨(Geeraerts, 2016)启发,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基于语言的互动性本质,认为构式作为实现语言交互主观性的基本手段,应采用社会取向的定义。

2.2.2 社会取向的构式定义

为避免认知取向构式定义带来的争议,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9)分别提出了社会取向的构式定义:“构式是一种用于构造或解释合格表达式的规约化范型,其中至少含有一个可被同一形式类语言表达填充的开放式槽位。”“构式为规约化(复杂)的形式功能配对体。”两个定义表述虽有不同,但两位作者在构式的社会规约本质这一点上完全一致。两位学者看来,构式不是心理储存单位,而是规约化语言表达。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7)指出,“构式并非(或不必然是)心理知识系统的一部分,而是历史中演进的语言符号系统的一部分。”从两篇论文的论述来看,构式的社会取向定义至少带来两方面逻辑后果。

首先是构式的范围。认知构式语法将构式视为心理储存单位,因此固定储存在说话人头脑中的音义复合体都属于构式范畴。这些音义复合体包含了抽象的句法格式、半抽象的句法格式、词汇以及语素。当构式的心理地位被取消后,凝聚这些不同复杂度语言单位的

^① Morin et al. (2024) 在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的基础上提出构式的社会转向,认为应将社会意义纳入到构式语法研究中。

理据也会随之消失,只有具备复杂构造的表达才会被视为构式^①。

其次是构式的功能。认知构式语法的心理语法立场一定程度上源于语言知识的理论概念以及认知语言学所谓的认知承诺(Cognitive Commitment)(Lakoff, 1990)。在此背景之下,作为语言基本单位,构式的核心功能在于表征语言知识,从而允准自然语言中的语句。在社会取向构式定义中,构式被认为是“语言使用者之间用以相互协调观点的工具”(Silvennoinen, 2023: 9)。当然,社会取向构式定义并不完全否认构式的认知属性,但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强调社会属性具有优先地位。为了论证这一立场,他引用了托马塞洛(Tomasello, 2003: 8)对语言社会属性和心理属性之间关系的看法:“语言符号即为一个体通过引导另一个体将注意力或心理状态聚焦于外部世界某物体从而达到与其共享关注焦点的社会规约体系。”

3 认知取向与社会取向之争的反思

毋庸置疑,交际是语言的核心功能之一。社会取向构式定义重点突出了语言的社会交际功能,对于揭示语言的本质属性具有重要意义。然而,取消或减弱构式的认知属性在理论和语言分析层面都面临一些挑战。本节首先指出两篇论文论证中存在的问题,然后具体指出社会取向构式定义面临的挑战。

3.1 哈斯普马特和西尔文诺伊宁论证中存在的问题

如前文 2.1 所述,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提出四点批评意见。我们认为前两点意见论证存在谬误,而后两点意见值得认知构式语法认真吸收。

首先,构式定义多变性问题。纵观各个学科的发展史,概念定义的不断演变是科学发展的常态(Popper, 2014)。语言学亦是如此。因此,构式的定义不断变化并不必然证明认知取向构式定义是错误的,反而可能是对构式本质理解加深的体现。

其次,构式判断标准的模糊性。笔者认为,构式判断标准的模糊性也并不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构成威胁,因为语言中的很多概念本身都具有连续统属性(continuum)。例如,霍珀(Hopper et al., 1980)很早就指出,受到话语因素影响,及物性实际上是程度问题。此后,泰勒(Taylor, 1989/1995/2003; 1998)将原型范畴概念运用到语言范畴中,系统展示了音系、词类以及句法构式的原型范畴特征以及范畴之间的模糊性。这一思路在弗朗西斯

^① 事实上,在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之前,很多学者(如 Tomasello 2003; Croft. 2007; Diessel 2019)将构式限定为复杂且抽象的语言结构。

(Francis, 2022)的研究中得到延续,指出语法判断也存在渐变性,即所谓的可接受度渐变性(*gradient acceptability*)。因此,构式与非构式之间的渐变性从理论上讲并非问题,心理固化本身就是程度问题,并不存在截然界限。事实上,昂格雷尔(Ungerer, 2023)已经系统阐发了构式的渐变性视角,并给出了判断构式地位的方法。

毋庸讳言,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对构式语法混淆个体与群体的批评有一定的道理。虽然认知构式语法从理论上并未否定构式的社会属性,但在具体构式分析中多侧重其认知表征。当然,在认知语法构式框架下,个体与群体的区分与融合完全是可以实现的,本论文将在第4节展开论述。至于最后一条批评意见,我们完全赞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关于概念识解具有社会属性的观点,但并不同意将社会属性置于认知属性之上的观点。相反,我们认为二者是概念识解的两个不同维度,相辅相成。

3.2 社会取向构式定义面临的挑战

社会取向构式定义自身也面临一些挑战。首先,无法捕捉认知构式语法所带来的重要洞见。社会取向构式定义认为构式仅包含具有复杂构造的语言单位,而将词汇和语素排除在构式之外。根据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的构式定义,构式必须以范型的形式存在,且具有空槽位(slot)。然而,人为将词汇及语素与复杂结构割裂,一方面无法捕捉二者之间的心理共性,同时忽略了不同语言单位的连续性特征。尽管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提出用“条目”(inventorium)来概括词目(lexemes)和复杂构造单位,但脱离心理语法背景这个概念并无太大意义。

其次,无法有效解释语言的认知加工机制。如上文所述(1.1小节),语言研究核心任务是模拟说话人头脑中的语言知识,即解释为什么人类可构造和理解从未听过、也未说过的句子。对个体说话人而言,所依赖的只能是其自身头脑中的语言知识,而非群体语言知识。当然,这些语言知识是经过群体规约化的语言知识,且在语言知识激活和使用过程中体现较强的交互主观性(intersubjectivity),但个体语言知识才是语言产生和理解的基础。

最后,不能全面揭示语言的创新和变化。众所周知,语言总是处于不断变化之中。语言变化当然离不开语言社区成员的一致意见,即规约化。但作为语言变化的起点,语言创新总是从个体向群体扩散的,其基础就是个体说话人的语言知识和语言认知能力(Blythe et al., 2021)。社会取向构式定义似乎难以全面解释语言创新背后的深层机制。

综上所述,哈斯普马特和西尔文诺伊宁主张社会属性优先甚至取代认知属性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局限。认知因素与社会因素往往相互交织、共同作用。认知取向和社会取向将二

者截然分离的方式并不可取,不仅会削弱对构式本质的认识,还难以全面解释构式的形成、使用与演变。因此,如何在方法论层面实现二者的有效整合才是构式研究的关键所在。这正是本文第四节要尝试回答的问题。

4 构式的认知—社会协同表征

认知取向与社会取向的分立,已构成构式研究的一个方法论瓶颈。虽然 Langacker (2016) 早已提出认知语法理论框架需要认知社会语言学路径的加入,把各种社会因素融入到语言的结构描写之中,但是却未给出具体的操作机制。正是这一方法论空缺,促使我们尝试构建一个既能容纳心理固化机制,又能反映社会规约过程的统一框架。

施密特 (Schmid, 2015; 2020) 的“固化—规约化模型”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ed Model, ECM) 在分析语言的双重属性方面做了很好的探索。该模型的理论出发点在于解释语言社区成员语言知识的高度一致性与明显的个体差异性。ECM 模型指出语言知识的一致性是规约化的产物,属于社会层面;个体差异性 is 说话人心理固化的产物,属于个体层面。联结二者之间的桥梁是语言使用:在语言使用中语言交际者通过协商与互动达成规约,同时个体说话人的语言知识得以在头脑中固化。该模型的理论架构如图 1 所示。可以肯定地说,该模型在已有文献的基础上有效统合了语言的认知和社会层面,也为厘清概念困惑,推动构式语法研究的立体化提供了重要启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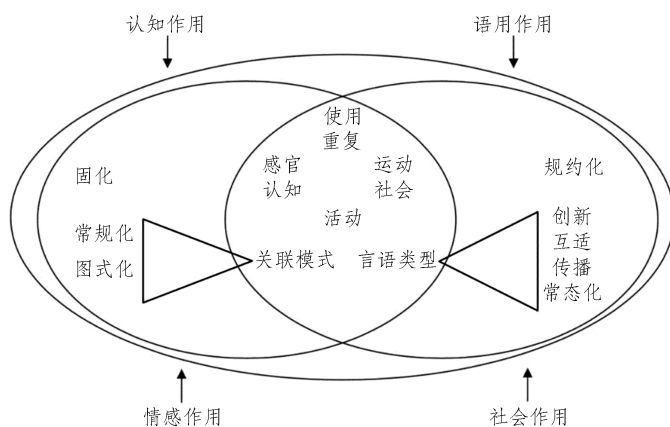


图1 固化—规约化模型 (Schmid, 2015:7; 陈西等, 2020:104)

然而,该模型仍然面临一定的实际挑战。首先,正如施密特 (Schmid, 2015) 本人承认,该模型仅仅勾画了一个“蓝图”和“理论框架”。这意味着其具体性和可操作性层面还有待进一步深入。正因如此,著名学者施耐德 (Schneider, 2022) 在评论中指出,ECM 模型并未完全超越构式语法解决实际问题。具体而言,施密特 (Schmid) 为了规避认知构式语法混淆

社会规约和个体心理储存以及“形式—意义”间的直接映射问题,采用“话语类型(utterance types)”这一概念。然而,“话语类型”并未清楚表明与语言各个层级结构如何相关,其概念清晰度还不如“构式”易于理解。因此,ECM 构建的这套新的平行解释体系来替代成熟理论框架的构式语法并未体现明显优势。

尽管如此,“固化—规约化模型”将语言视为社会规约与个体认知互动形成的自适应复杂动态系统,这一洞见无疑是深刻的。受此思想的启发,我们尝试在认知构式语法的框架内,将认知与社会因素融入构式表征,构建一个认知—社会协同表征模型,以期超越取向之争,探索一条整合性的分析路径。该模型旨在将构式的心理固化过程与社会规约化过程整合为统一的分析框架。

如图 2 所示,该模型由两个交互板块构成:左侧为“心理固化”,追踪构式在个体认知中的形成过程(重复激活→程式化→抽象化→构式固化);右侧为“社会规约化”,考察构式在言语社区中的共享与规范过程(使用事件→共同符号化→常规化→社会扩散→构式规约化)。两个板块通过“使用事件”实现耦合——个人在使用事件中加工语言材料并形成心理图式,社会在使用事件中通过互动协商确立共同约定。与认知构式语法经典的构式表征模型仅包含形义信息不同,该表征方式将个体认知图式和群体社会规约都纳入其中,构式化过程由交际者互动完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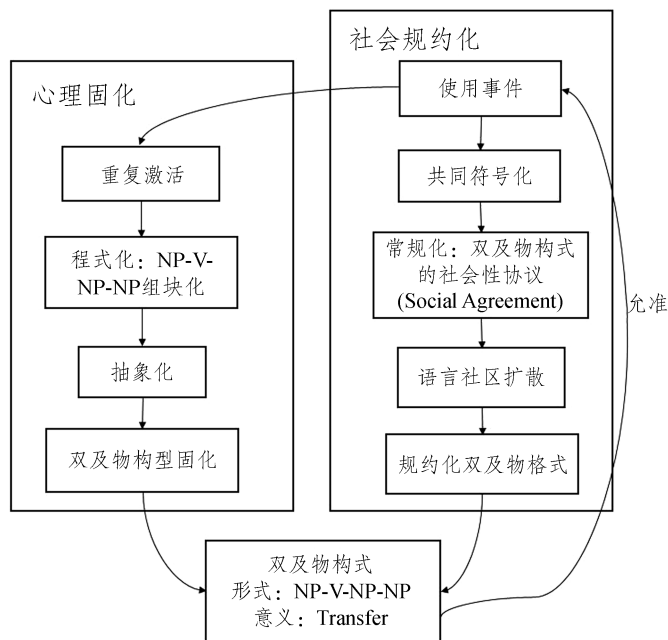


图 2 英语双及物构式的认知—社会协同表征

以英语双及物构式为例,在心理层面,个体基于内在语法系统(心理语法)对使用事件中输入的语言材料进行结构化加工(NP-V-NP-NP 结构化),通过认知抽象形成“及物构式

图式”,并提炼为可扩展的抽象模板,本质上是个体对语言规律的心理内化。在社会层面,语言社区在使用事件中通过反复协商确立共同约定(如 NP-V-NP-NP 构式的搭配规则),经由群体扩散强化其规约性,最终形成具有社会强制力的“及物构式协定”。认知与社会的循环耦合解释了个体创造性使用与语言系统稳定性之间的张力平衡,表明构式本质上是心理表征与社会共识的动态界面。这一表征方式可为构式多维立体研究提供启发。

5 结语

本文系统梳理了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起源和发展,详细综述了哈斯普马特(Haspelmath, 2023)和西尔文诺伊宁(Silvennoinen, 2023)两篇专题论文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的批评,以及社会取向构式定义的理论基础和具体主张。在此基础上,本文指出上述批评对认知取向构式定义存在误解,并分析了其在论证上面临的挑战。总体而言,两篇论文的论证虽存在一定偏颇,但其价值在于唤起学界对语言结构中社会因素的重视,有助于进一步推动认知语言学的社会转向。在此基础上,综合认知语法以及“固化—规约化”模型相关重要文献,本文论证了认知属性和社会属性是构式的一体两面,二者并非相互排斥,而是互为补充。基于此,本文尝试构建了构式的认知—社会协同表征方式,以期为构式的多维立体分析提供一个可能的整合性框架。

参考文献:

- 陈西,束定芳. 2020. 新构式的固化—规约化分析——以“可能 V 了假 X”为例 [J]. 语言教学与研究(5):103-112.
- 姜望琪. 2022. “构式”定义的变迁 [J]. 语言学研究(1):5-15.
- 牛保义,李香玲. 2020. 构式语法研究 [M].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 束定芳,张立飞. 2021. 后“经典”认知语言学:社会转向和实证转向 [J]. 现代外语(3):420-429.
- 叶浩生. 2011. 有关具身认知思潮的理论心理学思考 [J]. 心理学报(5):589-598.
- Blythe, R. A. & W. Croft. 2021. How Individuals Change Language [J]. *PLOS ONE* (6): e0252582.
- Chomsky, N. 1957. *Syntactic Structures* [M]. The Hague: Mouton.
- Chomsky, N. 1965. *Aspects of the Theory of Syntax* [M]. Cambridge: The MIT Press.
- Croft, W. 2007. Construction Grammar [G]//D. Geeraerts & H. Cuyckens.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roft, W. 2009. Towards a Social Cognitive Linguistics [G]//V. Evans & S. Pourcel. *New Directions i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Culicover, P. 1999. *Syntactic Nuts: Hard Cases, Syntactic Theory and Language Acquisi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Culicover, P. & R. Jackendoff. 1999. The View from the Periphery: The English Correlative Conditions [J]. *Linguistic Inquiry* (4): 543-71.
- Culicover, P. & R. Jackendoff. 2005. *Simpler Syntax*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Dałbrowska, E. 2008. The Later Development of an Early-emerging System: The Curious Case of the Polish Genitive [J]. *Linguistics* (3): 629-650.
- Dałbrowska, E. 2012. Different Speakers, Different Grammars: Individual Differences in Native Language Attainment [J]. *Linguistic Approaches to Bilingualism* (3): 219-253.
- Dałbrowska, E. 2016. Cognitive Linguistics' Seven Deadly Sin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79-491.
- Diessel, H. 2019. *The Grammar Network: How Linguistic Structure Is Shaped by Language Us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ivjak, D. 2017. The Role of Lexical Frequency in the Acceptability of Syntactic Variants: Evidence from *that*-Clauses in Polish [J]. *Cognitive Science* (2): 354-382.
- Divjak, D. 2019. *Frequency in Language: Memory, Attention and Learning*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Fillmore, C., P. Kay & M. O'Connor. 1988. Regularity and Idiomaticity in Grammatical Constructions: The Case of *let alone* [J]. *Language* (3): 501-538.
- Fillmore, C. 1988. The Mechanisms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G]//*Proceedings of the Eleven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Berkeley, CA: Berkeley Linguistics Society.
- Flach, S. 2020. Constructionalization and the Sorites Paradox: The Emergence of the Into-causative [G]// L. Sommerer & E. Smirnova. *Nodes and Networks in Diachronic Construction Grammar*. Amsterdam: John Benjamins.
- Francis, E. 2022. *Gradient Acceptability and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eeraerts, D. 2016. The Sociosemiotic Commitment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527-542.
- Goldberg, A. 1995. *Constructions: A Construction Grammar Approach to Argument Structure* [M]. Chicago /London: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 Goldberg, A. 2006. *Constructions at Work: The Nature of Generalization in Language* [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Goldberg, A. 2019. *Explain Me This: Creativity, Competition, and the Partial Productivity of Constructions* [M]. Princeton/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ies, S. 2022. On, or Against? (just) Frequency [G]// H. C. Boas. *Directions for Pedagogical Construction Grammar*.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rder, P. 2010. *Meaning in Mind and Society* [M].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Haspelmath, M. 2023. On What a Construction Is [J]. *Constructions* (1): 1-15.
- Heritage, J. 2005. Cognition in Discourse [G]// H. Molder & J. Potter. *Conversation and Cogn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ilpert, M. 2019. *Construction Grammar and Its Application to English* (2nd Edition) [M]. Edinburgh: Edinburgh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T. 2022. *Construction Grammar: The Structure of English*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T. & G. Trousdale. 2013. *The Oxford Handboo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Hoffmann, T. 2017. Construction Grammars [G]//B. Dancygier. *The Cambridge Handbook of Cognitive Linguistic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Hopper, P. & S. Thompson. 1980. Transitivity in Grammar and Discourse [J]. *Language* (2): 251-299.
- Langacker, R. W. 2005. Construction Grammars: Cognitive, Radical, and Less So [G]//F. J. Ruiz de Mendoza Ibáñez & M. S. Peña Cervel. *Cognitive Linguistics: Internal Dynamics and Interdisciplinary Interaction*.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Langacker, R. W. 1987. *Foundations of Cognitive Grammar. Vol. 1: Theoretical Prerequisites* [M]. 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08. *Cognitive Grammar: A Basic Introduction*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Langacker, R. W. 2016. Working Toward a Synthesi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4): 465-477.
- Lakoff, G. 1990. The Invariance Hypothesis: Is Abstract Reason Based on Image Schemas? [J]. *Cognitive Linguistics* (1): 39-74.
- Marr, D. 1982. *Vision: A Computational Investigation into the Human Representation and Processing of Visual Information* [M]. New York: W. H. Freeman.
- Morin, C., G. Desagulier & J. Grieve. 2024. A Social Turn for Construction Grammar: Double Modals on British Twitter [J]. *English Language & Linguistics* (2): 275-303.
- Möttön, T. 2016. *Construal in Expression: An Intersubjective Approach to Cognitive Grammar* [D]. University of Helsinki doctoral dissertation.
- Popper, K. R. 1979. *Objective Knowledge: An Evolutionary Approach* [M]. Oxford: Clarendon Press.
- Popper, K. R. 2014. *Conjectures and Refutations: The Growth of Scientific Knowledge* [M]. New York: Routledge.
- Schmid, H. 2015. A Blueprint of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J]. *Yearbook of the German Cognitive Linguistics Association* (3): 3-25.
- Schmid, H. 2020.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Schneider, E. W. & H.-J. Schmid. 2022. The Dynamics of the Linguistic System: Usage, Conventionalization, and Entrenchment [J]. *English Language and Linguistics*, (1): 209-216.
- Silvennoinen, O. 2023. Is Construction Grammar Cognitive? [J]. *Constructions* (1): 2-17.
- Stefanowitsch, A. & S. Flach. 2017. The Corpus-Based Perspective on Entrenchment [G]//H. Schmid. *Entrenchment and the Psychology of Language Learning: How We Reorganize and Adapt Linguistic Knowledge*.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 Taylor, J. R. 1989/1995/2003. *Linguistic Categorization: Prototypes in Linguistic Theory* [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Taylor, J. R. 1998. Syntactic Constructions as Prototype Categories [G]//M. Tomasello. *The New Psychology of Language: Cognitive and Functional Approaches to Language Structure*. Mahwah, NJ: Erlbaum.

- Tomasello, M. 2003. *Constructing a Language: A Usage-Based Theory of Language Acquisition* [M].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Ungerer, T. & S. Hartmann. 2023. *Constructionist Approaches: Past, Present, Future*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 Ungerer, T. 2023. A Gradient Notion of Constructionhood [J]. *Constructions*, 15:1-20.

On What a Construction Is: The Dispute Between the Cognitive and Social Perspective

HUANG Jun WANG Liyong

Abstract: Construction grammar, as a significant school in theoretical linguistics, has seen ongoing academic debate over the definition of its core concept “construction”. Cognitive Construction Grammar, represented by Goldberg, views constructions as units stored in the mind, emphasizing their cognitive properties. However, Haspelmath and Silvennoinen, in a special issue of *Constructions*, challenge this perspective, arguing that constructions should be defined based on social conventions, thereby highlighting their social attributes. In response to this debate, this paper systematically reviews the theoretical origin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cognitive orientation in defining constructions, examines the critiques raised by the two scholars against the cognitive approach as well as their own social orientation, and clarifies the inherent unity of cognitive and social attributes in the definition of constructions. On this basis, with a view to systematically integrating social attributes into constructional analysis, this paper draws on the “Entrenchment-and-Conventionalization Model” (Schmid 2015, 2020) and proposes a cognitive-social synergy mechanism, aiming to provide an operational framework and to further refine the theoretical framework of construction grammar.

Key words: construction definition; cognitive orientation; social orientation; dual attributes; cognitive-social fusion representation

责任编辑: 蒋勇军